

他治好了黄河源区近80万亩“草原之癌”

记40载种草复绿的青海达日县草原站站长罗日盖

本报记者 李宁、李占铁、李劲峰

巍巍巴颜喀拉山脚下，广袤的草原褪去夏日的青色，或被皑皑白雪覆盖，或在枯黄中等待来春。

一位头戴藏式毡帽，面容粗粝黝黑的藏族汉子，扒开冰雪，拔出一绺牧草，看看根系发育长度，放在鼻尖轻嗅。迈着瘸拐的步子，一边细数草原上鼠洞数量，一边盘算需要补种草籽的面积。

三年前，这片区域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黑土滩”。

驻扎海拔四千多米的黄河之源，每年在草原上风餐露宿野外作业200多天，治理好近80万亩“草原之癌”黑土滩。这是罗日盖过去40年来的工作常态。

黄河走东海，万里入胸怀。
扎根坚守“三江源”，治理草原“黑土滩”。过去40个春秋中，身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草原站站长，罗日盖始终践行着基层草原工作者“甘当一棵小牧草，保护生态大草原”的初心使命。

触目惊心

“脱掉几层皮，也要夺回绿草原”

“新种的草一定要注意灭鼠。草原上的高原鼠兔，最爱掏洞吃草根。根被吃完了，好不容易成活的草，也就危险了。”年过60岁的罗日盖站在冬日草场上，规划着新一年的灭鼠和种草安排，仿佛丝毫不觉寒冷。

罗日盖看着手中的牧草，犹如看着一手培育带大的“孩子”，他的双眼闪烁着光芒：“别看现在草场都是黄的，来年春风一吹，就满眼绿油油，生命力旺盛。”

黄河之水青海来，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素有“中华水塔”美誉。

平均海拔4200米的达日县，属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流经达日县总长340公里。占全县面积达95%的2227万亩草场，成为黄河源头重要水源涵养地。

1977年，达日县举办拖拉机驾驶和维修技能培训，每个村有两个名额。出生在达日县上红科乡哈青村的罗日盖被幸运选中。

带着一床被褥、一袋糌粑、一小桶酥油，没上过学的罗日盖，第一次离开了家。

“当时交通差，从家里到县城骑马就得走两天。”罗日盖回忆说，培训点在县农技站，几间小土坯房既是教室又是宿舍，没有床只得打地铺。夏天暴雨倾盆，屋里经常被淹得无落脚之处；冬天气温骤降，一床旧被褥是抵御零下30摄氏度寒冷的唯一温暖。

在这样艰苦环境下，不少人选择离开，只剩罗日盖等4人坚持了下来，“拖拉机是当时草原上少有的机器。”罗日盖说，那时唯一想法就是，既然来了，就要踏实学习，咬牙坚持，绝不能浪费机会。

凭借着凑着煤油灯熬夜看书的拼劲，两年半学习，罗日盖从一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长为全县小有名气的拖拉机修理能手。

1981年，22岁的罗日盖被分配到达日县草



▲2020年7月11日，罗日盖在查看达日草原的牧草生长情况。（新华社发 刘红摄）

执着种草

“每天看着草原，心里才觉得踏实”

治理黑土滩，源头在种草。

虽在草原出生长大，但看着本子上记录的数据，罗日盖还是不禁皱眉：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年平均气温零下0.5℃，牧草存活率仅20%到30%……

黑土滩复绿，关键在于选择草籽，合理养护。过去，当地常用草籽主要是垂穗披碱草，种下去几个月，依旧光秃秃。

“跑断这双腿，也要找到好草籽。”没有任何种草经验的罗日盖从零开始，一种试种、一季季种、一次次测。

听闻省里专家下乡，从草场下来的罗日盖往来不及换衣服就跑去咨询，“不怕专家笑话我身上带土，怕他们笑这黑土滩治不出效果。”

白天蹲在草场录数据、找问题，晚上总结原因、请教方法，罗日盖帐篷的灯常常亮到凌晨。

对比近20种草籽，罗日盖在专家指导下，新发现中华羊茅草、冷地早熟禾两种适合草籽，并探索出“混播混种”方法，“混播混种的草，能扎根、长得高，管得好能绿10年。”

找到合适的草种，却只是黑土滩复绿的第一步。由于大量进口草籽熬不过冬天，不少以次充好的草籽生不出芽。往往花大价钱购买的种子被混入“杂牌军”，草籽乱象又让罗日盖夜不能寐。

“刚开始时，几批劣质草籽种下去不发芽，心疼得很。”多次惨痛教训，让罗日盖对草籽的重量、手感、味道，都烂熟于心，由此练出识别草籽质量的“火眼金睛”：

一看，在同等质量下看哪个袋子浅；二揉，搓揉草籽去皮，看里面有没有胚芽；三听，把草籽放在炉盘上烤，“火烤后表皮鼓起，有细微爆炸声，就像爆米花一样，就是合格好种子”。

此后不少供货商以次充好伎俩，都被他轻松识破。仅今年采购的800吨草籽，有560多吨被罗日盖认定不合格后被退回。送礼品、给回扣，对他都不管用，“恨我的供货商多了，各种恐吓让我小心点。但为了草原，决不能昧良心。”

1995年，罗日盖成为草原站站长。每年春夏，就是他和同事最忙碌的季节。有路的地方开车进去，不通路的地方，赶骡子或骑摩托车，也得将草籽驮进去。

平地上可用微耕机播种，但大于25度的坡度，无法使用机器播种，只能依靠人工。整个山坡都是罗日盖和同事种草的身影。

每次上草场，罗日盖都养成习惯：先爬过围栏、越过泥地、一路小跑到草场最高点，或蹲或趴，仔细检查草籽生长情况，“只有最高处的草活了，下面草的成活率才有保证”。

草原上鲜有人家，他和同事带着帐篷，哪里种草就住哪里，最长时一待便是几个星期。有时连阴细雨，被子都是湿淋淋。有一次，帐篷半夜里

被狂风吹跑，罗日盖只好挤到同事帐篷里过夜。

草原的天，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有时刚发芽的草籽，遇到暴雨乃至冰雹袭来，草场一片残破，辛苦种草往往前功尽弃。

今夏记者在达日县窝赛乡直却村看到，草籽种下三年，牧草长得膝盖高。新种幼苗穿透一层绿色薄膜，长势喜人，与远处黑土滩形成鲜明对比。

“这层绿膜叫无纺布，能保持土壤温度，有助于幼苗扎根，就能不惧风雨，两个月后自然风化，不污染环境，牧草成活率能从30%提高到80%以上。”一说起种草，罗日盖如数家珍。

每次购进草籽，都要逐批检查；上山下沟查看牧草长势，总是不顾膝伤一路小跑；看到破坏草原的牧民，毫不留情教育半天……

无比执着的罗日盖，就像一头倔强的牦牛，在草原上远近闻名。

40年来，罗日盖探索出治理黑土滩的多种有效种草方法。昔日牲畜绝迹的近80万亩黑土滩，如今变成了牛羊遍地的绿草原。

奇迹背后，是罗日盖常年带着一顶帐篷、一床被褥、一包糌粑、一个酒精炉、一瓶治糖尿病的药，迈着严重受损双膝，奔走草原风餐露宿。

“在草原上工作，注定要多跑路、多吃苦，多流汗。”罗日盖说，但每天看着草原，心里才觉得踏实。

草场复绿

“人没了不要紧，草还在就行”

距离达日县城100多公里的满掌乡，是达日县黑土滩最严重的一个乡。最高峰时，超过70%的草原成为黑土滩。

满掌乡三社社长群杰回忆起10多年前的经历，抹着眼泪说，黑土滩那时几乎扩散到所有草场，一半牧民被迫拖家带口，到四川色达等地租草场放牧，“谁愿意离开世代生活的草原呀，还不是被黑土滩逼得没办法！”

黑土滩复绿，既要发动牧民种草，还要在群众心里播撒保护生态的种子。最初带领牧民们种草的场景，罗日盖至今记忆犹新：

“听到草原上来了个会种草的干部，不少牧民纷纷返回来。我先约法三章：大家必须一起种草，新草至少禁牧一年；划分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保证畜草平衡。”

然而，“牛羊比草重要”“宁可走牧，也不种草”等观念，在很多牧民心中根深蒂固。满掌乡查干村牧民先多过去只放牧、不种草。面对这个“钉子户”，罗日盖一次次拉着先多，说政策，讲原因，谈前景。

一次，罗日盖带着先多，看到周边牧民草场由黑变绿，牛羊成群，而他家牧场草吃没了，牲畜仅剩6头。先多回家想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先多拿起铁锹，背上草籽，走进了黑土滩。现在饲养100多头牦牛的先多，不仅带头种草，还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承担起草原防火、保护野生动物、生态监测等任务。

回忆起当时的执拗，先多满脸羞涩地说，草原是牧民的根，只有种好草，日子才会好，“这些都是罗站长教我的，他是大恩人。”（下转14版）

中学时代他便知道他30多年后他逮捕了他

三十余年间，他成长为扫黑除恶的得力猛将，成了英雄；他却成了黑恶团伙的首要分子，锒铛入狱。两人的经历，成为我国几十年来不断推进法治建设、持续打击黑恶势力的见证

本报记者 王井怀、梁娣、尹思源

学生时代，“如雷贯耳”

1987年，14岁的孙冀考入天津市第四十一中学。上初中不久，他便听说过当地有名的“玩闹”颜锦的“大名”。“玩闹”是天津人对小混混的叫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不少地方的中学门口，时常有小混混聚集。打架斗殴、勒索师生、调戏女生……

在一个法制尚不健全的社会里，人们会崇尚暴力。“那个时候，谁家出个小偷，抬不起头来，但谁家出了个打架斗狠的，一家人觉得有面子。”年近五十的孙冀回想起来说。

上世纪80年代，天津市不同的区有不同的“玩闹”，一些辍学的半大孩子便跟风，去学校门口“站点”，划归势力范围。

只比孙冀大1岁的颜锦便是其中一位小有名气的混混。颜锦的名气来自“少管所”的经历。当时，少年犯管教所是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进行教育、挽救、改造的场所，简称少管所，是我国在那个年代的劳动改造机关之一。

孙冀第一次听说颜锦这个名字，是在颜锦进入少管所后。“那时候，不少学生都知道有个叫颜锦的，打架凶，把自己打到少管所去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梳理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演变过程时说，上世纪80年代，受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青少年学生模仿影视上和小说中的黑社会模型拉帮结派，出现了一系列的青少年“黑帮”。这些青少年的犯罪大都属于结伙犯罪，不仅具备了恶势力的基本特征，而且成了恶势力犯罪的主力。

二十四岁 人生转折

高中毕业后，孙冀考入天津市警官学院，此后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工作，穿上了警服。

工作第一年的春节前夕，孙冀所在派出所值班辖区内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的案件。孙冀跑到现场负责外围警戒。

一会儿，来了一群坐着吉普车的人，穿着翻毛的大衣，威风凛凛。

“这是干嘛的？”孙冀问身边的人。

“五处大案队的。”

从那一刻起，“当这样的警察”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孙冀心中生根，发芽。

但刑警工作累，风险高，“干这行危险不说，还没日没夜的，会影响结婚生子的。你才二十多岁，要想清楚。”有老刑警这样对孙冀说。

“没做过刑警的警察，从警人生是不完美的。”上世纪90年代，警察圈里流行的这句话让孙冀下了决心，参加了天津市公安局的内部遴选。

1997年6月1日，通过内部遴选，孙冀前往天津市公安局五处大案队报到，成为一名刑警。

这一年，孙冀24岁。

比孙冀大一岁的颜锦也在他24岁那一年迎来了人生的拐点。

刑满重出江湖，披上合法外衣

对普通人来说，牢狱生涯是污点。然而，对惯犯来说，这似乎成了“镀金的履历”。

1996年，天津市公安部门破获了当时全市最大的流氓团伙案。颜锦和他的“兄弟们”迎来了法律的审判。团伙前五名均被判处死刑，排名第六的颜锦因为认罪态度较好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24岁这年，颜锦则开启了自己的牢狱生涯。

正是在这一阶段，我国法律越来越完善。

1997年，我国对刑法进行了一次具有时代气息、里程碑意义的修改。其中，刑法中增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黑恶势力的打击更加有法可依。

其中，受害最深的是天津市著名的民企塑力集团。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塑力集团不得已向颜锦借起高利贷。

“原本说是按千分之三的利息算，我们还清债务后，颜锦提出是按‘利滚利’算，一下子多出了7个多亿的债。”民企塑力集团总裁办主任刘女士

说，还不起钱，他们就把企业占了。

刚刚刑满释放的颜锦明白，想要让自己的“事业”长远发展，就不能事事冲锋在前。于是他开始隐居幕后，一边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一边力图洗白自己。

警方调查发现，2011年至2018年，颜锦有组织地实施多起敲诈勒索、聚众斗殴、非法拘禁、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犯罪活动。但颜锦都隐藏幕后，甚至下达指令都是经过中间人。

不仅如此，颜锦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聘请法律顾问。塑力集团案件中，作为颜锦黑恶团伙核心成员的律师出谋划策：软禁塑力集团老板，逼迫其签订新的11份合同，将不合法的高利贷合同合法化为正常合同，“他们从事的违法犯罪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不仅有律师，签订合同时还有公证员在场。”孙冀介绍。

这时的颜锦在外人看来更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参加多项公益活动，捐建爱心小学，直到现在还能在网络上搜索到他在多所高校设立“颜锦奖学金”的新闻，甚至被一所高校授予“教育贡献奖”……

黑社会组织一般有三个阶段：一是耀武扬威阶段，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黑社会，以此赢得道上的名声；二是退居幕后，坐收渔利；三是披上合法外衣，洗白自己。

“发展到这个阶段，再不打就晚了。”孙冀说。

紧要关头，重拳出击

2018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项斗争开始。重犯落到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二支队三大队大队长孙冀的身上。

其实，在此之前，颜锦一伙已经进入天津市公安局的视野。2017年12月，针对群众举报线索，天津市公安局成立高规格专案组，要求将颜

锦团伙一举打掉。

作为专案组负责日常侦查工作的负责人，孙冀迅速投入到了此次的案情侦破工作当中。由于颜锦行事谨慎小气，且保护伞众多，掌握证据难度较大。专案组紧密围绕颜锦的关系人进行分析研判，并对以往案件进行串联，开展调查取证。

“被害人不敢讲，证人不愿讲”成了调查取证工作的瓶颈。颜锦的恶名太大，对待被害人通常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先是威胁，再给钱封口。有的被害人多次更改口供，还拒绝伤情鉴定，取证难度很大。

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将其中一名重要骨干成员抓获，借此拿到颜锦涉案的直接证据。

2018年1月，孙冀和天津市公安局协调全市抽调的200多名警力一起，一举抓获颜锦及其团伙主要犯罪成员。

此后，长达数万页卷宗所呈现罪行，一一展露在办案人员眼前。

2020年7月3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颜锦等34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公开宣判。

颜锦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打掉颜锦犯罪集团，在天津扫黑除恶斗争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场覆盖全国的专项斗争中，天津率先提出创建“无黑”城市目标，制定“无黑”城市创建指标，开展“无黑”村（社区）、“无黑”单位等10项基层“无黑”创建工作。

三年来，天津打掉黑恶势力团伙100个，涉恶犯罪团伙50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850人，494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